

捕捉大地的声音和气息

——读王剑冰散文集《塬上》

□石华鹏



散文家王剑冰先生的《塬上》是一部关于故乡的散文集子。故乡是一个能掀起话语风浪的词汇,提起故乡,每个人都有话可说、有情可抒,所以关于故乡的书写可以用“汗牛充栋”一词来形容。或许关于故乡的谈论常说常新,所以关于故乡的书写永远不会停息。故乡是文学永远的出发地和生长点。《塬上》辑录22篇散文,以第二故乡、少年及青春时光、真正的家乡以及故乡关联人事等内容分类,辑录名“塬上”“旷野”“地气”“源流”“相系”。如此辑录,有着某种意义的象征:一方面,向我们呈现了一个建立在个人视域上的立体的乡村世界;另一方面,向我们揭示了一个作家的心理历程——他的地域来路、文化来路和精神来路。

王剑冰的散文沉稳大气,语言朴素亲切,叙述舒缓流畅,有着小说一般的吸引力。《塬上》这部书中,辑为“旷野”“地气”“源流”的文章,讲述自己家乡的人事,此类作品作者众且论述充分,这里不再赘述;辑为“塬上”“相系”的文章,在散文的内容和形式上多有拓展,值得谈论。

从作品看,“离去归来”的叙述模式仍是激发写作灵感、催生佳作名篇的有效方式之一。鲁迅、沈从文等现代文学大家以此为叙述模式创作的《故乡》《湘行散记》等经典作品,为中国乡土叙事开辟了怀旧中期许、在现实中反思的现代写作道路。王剑冰重拾“离去归来”的叙述模式,写出了《塬上》《塬上·春日》《祖巷》《大河至上》等作品。可以说,“塬上”“相系”在尝试开拓一条新的乡土散文写作路径,即站在中国乡土现场的一角,用脚步和文思往上游溯乡土的文化来路,往下游投去悲悯和期许的现实目光,作者的写作成为某种连接,即在追忆文化过往和描述现实境况之间,找到持续性的、变化之间的本土本源。

王剑冰的“离去归来”有些不同,他离开自己的故乡,归来的却是他人的故乡,这是时代所催生的一种新的写作素材的准备方式。作者主动到陌生的塬上深入生活,这一深入就是三年。不过,王剑冰先生并不认为他归来的是他乡,他借用海德格的话“故乡处于大地的中央”来为自己注释。他归来的是乡土,是大地,是与自己少年成长相通的另一个故乡。如此一来,他所抵达并驻留的塬上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陌生的塬上给他“异样的新鲜感,历经孤独与单调,感受了四季时光”;另一方面,异乡即故乡,塬上的乡土和大地勾起他童年、少年乃至青春的经历,激起了相同的生命情感和人生情怀。异样的新鲜感和相通的情怀,让他笔下的文字,既跳跃着现实的生机活力,又流淌着深沉的情感之河;既有一种令人沉入其间的塬上乡土经验带来的陌生感,又有一种人与人、人与大地相守千年所形成的亲切感。

读过“塬上”“相系”里的这组文章之后,我感觉到,与传统深厚的乡土散文相比,这些散文提供了一种新的叙述维度。乡土散文的写作已经有过特质分明的两个维度,一个是城市化进程的车轮驶过乡村之后,对乡村现实的反思和批判;一个是人们离开乡村之后,对乡村生活田园牧歌式的美化和回忆。“塬上”“相系”里的这组文章放弃了社会学上的反思和批判,也放弃了“小资情调”或“乌托邦”式的美化和回忆,而是重返乡村,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重新去发现一个乡村。当下乡村那种安静而朴素的人物行为和内心世界,乡村四季转化的境况与秘密,乡村大地上那种深沉的声音与气息,一一被作者记录、描述、倾听和捕捉,与其说“塬上”“相系”是一部深入生活的作品汇集,不如说是一次“文学塬上”的成功建造。

“文学塬上”的建造方式,不像在平地上起高楼那样向上生长,而是如黄土塬上掘地挖坑辟出地坑院那样,向下深入,向土地四周拓展,它躺在土地的怀抱里,安全,自在,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景观:“他们以低处的光,照耀自己。”

“文学塬上”的成功建造,首先在于对塬上人的独特理解和温暖体温。塬上不再如过去那般热闹,多数年轻人去了城里谋生活,留在塬上的多为老年人。塬上是清寂的,但不荒凉和衰败,老人成为塬上生活的守护者和对外游子的心灵召唤者。作者在塬上行走,遇到和记录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塬上人的故事。文学是人学,对人的理解和体温,实则是对塬上不灭的人性和灵魂的深切表现,走进了人的世界就等于走进了塬上的世界。比如,某个普通早晨,院坑里上来两位老人,两人中间是一辆小架子车,老人前面拉着,老伴后面推着。上了村路之后,老伴将自己身子安置到车上,老人蹬着车出村去,“风柔顺着一缕花白的头发”。作者描述这幅画面之后,感慨地写道:“真的,那绝对不是晚景凄凉的感觉,那是朝霞四射的感觉……虽然儿女们不在身边,在外边只要好好的,不给老人添麻烦,老人就是安心的,快乐的。你看他们多么安逸呀。”我知道并不是所有塬上老人都这么安逸,但我被这种安逸的存在所打动,我也相信这是塬上千百年来留存下来的一种本质的生活。比如,从小在塬上外婆家长大的小姑娘,如今到城里上大学了,只要有空就会回来看望外婆,外婆很老了,一人居住,小姑娘一回来就为外婆去打水,两人吃一顿外婆做的饭,待一两天就离开了。如此往复。平常行为融进最割不断的深情。比如,儿子带着媳妇和孙子回来了,老人们再提多高兴,换上新衣服,呵呵呵地笑着。一只土狗从孩子身边跑过,孩子没有躲闪和惊恐,伸手去抚摸表示友好时,倒是城里的妈妈慌得很,赶紧把孩子拉到一旁。这一细节让人感慨,塬上的生活终究会有后代接续下去。再比如从外地嫁到塬上的翠翠,从城里回来安胎,她特别喜欢这里,称这里是人间奇迹,说“想不到地的美好全藏在地平线以下”……作者笔下的塬上,总有人离去或者归来,塬上质朴的土地不仅生长着万物,也生长着人间的美好和爱。

“文学塬上”的成功建造,其次在于对塬上大地独特细节的发现和捕捉。读塬上这组文章,我时不时会被文中氤氲着的浓郁的文学气氛感染,作者的笔如微创手术中的机械臂那般,总在塬上被忽略或被隐藏的日常生活细间游走探寻,对事物秘密的发现和捕捉精准而迅捷。而那些细节,要么传递出一种普遍的人间情感,要么传递出一种形而上的思考。所谓文学气氛,即指被一种情感打动和被一种思考征服。作者写道:“整个的塬,所有的生命都在拔节。”作者还写道:“天黑严的时候,坑院就成了一种暗物质。我想,这种暗物质虽然各自独立,在塬上它们却是相通的,它们内部所进行的事情也大致相同。”作者不仅写下了生命拔节的声音,也写下了暗物质自身的光亮。比如,塬上有一种声音叫默默坐着,两位在岁不老的老人坐在坑院的拦马墙跟前。他们并不说话,只是那么呆呆地坐着。但是你能感觉出来,尽管他们不说话,那话却是一直在说着的。他说,上啊?他说,是,上啊。他说,今天天不错。他说,是,天不错。他说,又活过去一天。他说,是,又活过去一天……两人几乎天天默默坐在那里,却不停地说着。比如,大地的气息,不仅是地坑院上田野里的各种草味花香,冬季里的大雪和夏季里的流水,也是坑院里隆重盛大的嫁娶场面和筵席之后,那种笼罩着温暖与温情的巨大的安静与深沉。作者在“后记”中深情地写道:我在塬上,在生活的深处,往往能感到那种安静的、深沉的大地气息。作者对塬上大地的声音和气息的聆听和捕捉,让这塬上的故事具有了永恒的文学性价值。

塬上生活的本源是什么?生命与文化内涵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在这部《塬上》中。每个人从中找到的答案或许不一样,我得到的答案是:生命和记忆生生不息,这是大地的馈赠。

可以说,《塬上》是王剑冰先生重要的作品,这里边的文章不仅与他的生活和生命息息相关,而且这些文章重新阐释了散文写作最朴素的真理:无可替代的生活经验和人生经验,真诚深厚的情感、爱、怜悯,以及美妙的表达。

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器具会像瓷器这般神奇:本为自然界的土石,经水火之力、匠人之功,便蜕变成永不变形、永不改色、永不腐损的存在,然后或成为寻常百姓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或用作帝王将相珍爱的把玩之物,或变成藏家、商贾疯狂追逐的对象。

说到瓷器,就不能不说到景德镇。我的家乡景德镇约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孩童时代便会唱与瓷器有关的歌谣,会把烧瓷后废弃的圆形渣饼用作游戏。当瓷杯瓷碗摔碎后,相伴的必然是妇孺皆能言的一句话:“到锁上去了”;瓷杯瓷碗破损不太严重时,便会收拾好、保留好,等待着铜瓷人像变魔术般地将破瓷重圆。许多事物入眼后便会入心,我的心田自小便埋下了一颗瓷器的种子。

当我在文学之苑盘桓了一阵之后,特别是写完《佛印禅师》之后,对禅师论及的制瓷与修禅猛然间像开化了一般,有了一种特别的体悟,便萌动念头,要把那颗沉埋在心底的瓷器种子移植到小说园地。

我一次又一次走进了景德镇。在面貌依稀可辨的御窑厂流连忘返,在烈火烹油的窑火前观望思索,在美器满眼的瓷博物馆寻寻觅觅,在满满满柜的图书资料中披沙沥金,在研究机构 and 窑场瓷厂向学者、瓷人求问请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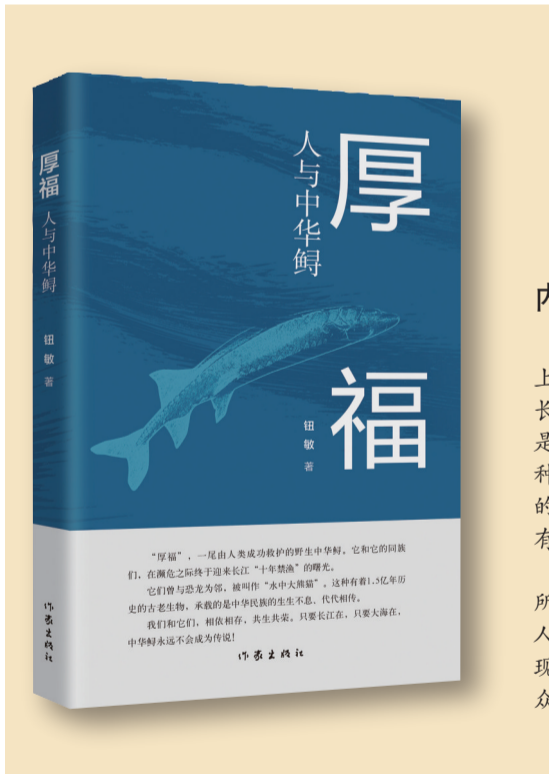
在进行了如此这般的生活体验和素材积累之后,我蓦然发现,我对瓷器似乎变得陌生了。那瓷器已不再是我天天在眼在手的普通器物,不再是泥胎为骨、釉料为肤、彩绘为妆的寻常器具。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四个字:器以载道。且固执地认定,这和古今普遍认同的“文以载道”同样丰富、同样深刻,也同样精彩。

不妨将我探求获得的瓷器故事略陈数端:

——明代,朝廷正式在景德镇设御窑厂。万历年间,皇家要烧造器型硕大的龙缸,几番不成。一个叫童宾的看火工,不忍工友们因此受辱受罚,一声大吼纵身跳入窑中,龙缸得以烧成。这个童宾后被尊为“风火神”,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还在御窑厂建了“风火神庙”,供奉童宾。这座庙宇至今还在,并且日夜香火不熄。

——还是明代,英宗朱祁镇幼年登基,他像父亲宣德皇帝一样,喜爱在特制专烧的瓷罐中斗蟋蟀,罐中一只品相出众的蟋蟀相当于一匹骏马的价钱。皇太后和太上皇担心小皇帝玩物丧志,累及江山社稷,下令敲碎了所有御制的蟋蟀罐。其后,这个年代的蟋蟀罐成为众多藏家追逐的对象,至今依然。在景德镇的陶瓷考古中发现了这个年代蟋蟀罐的瓷片,每一片都价格不菲,一张名片大小的碎片相当于一头牛的价格。

——清康雍乾三代,国势鼎盛,称作盛世。瓷业也如日中天,官窑烧造的瓷器数量、品类、质量可谓空前绝后。几十年来,在国际市场上拍卖的中国瓷器中,单价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其中一半以上制作在乾隆年代。但从嘉庆后,官窑御瓷的制作便江河日下,到了光绪年间,更是走进了衰败之境,被迫决定关闭御窑。无沃土时雨便无草木之繁茂,无国家之昌盛则无瓷业之辉煌。



器以载道

——《御窑重器》创作琐谈 □吴仕民

——瓷器光华夺目,成为许多人家的珍藏,或转换成许多人家的黄金白银。但制作这些人间珍宝的瓷工窑工,却是艰辛备尝,穷困潦倒,从早到晚穿着一双草鞋劳作,景德镇也由此被称作“草鞋码头”。瓷器的宝光辉映着人间的不平。咸丰十年,太平天国的军士进入景德镇,因见到瓷工窑工生活的惨状,愤而用一把火把御窑厂化作了废墟,御窑厂其后十年未能举火升烟。

——墨分五色是水墨书画的极高境界,绘瓷匠人在把含有金属成分的浓稠青花料绘在瓷上时,居然也能墨分五彩,从而造就了青花瓷的天工神韵,无穷魅力。民国时的王步则把这技艺发挥到了极致,因而被称作“青花大王”。他还在晚年立下宏愿:画500个青花碗,烧成后无偿送给使用破碗裂杯吃饭喝茶的瓷业工人,只是因天不假寿而未能遂愿。在瓷器的光芒中,闪烁着无尽智慧、真诚和善良。

——瓷中珍品往往成为无数人追逐的对象。于是便会有天价交易、惊人欺诈,甚至会有刀枪相向的故事发生,使洁白若雪的瓷器蒙尘积垢,乃至染上血污。1926年,一名叫刘昆的北洋军阀师长兵败路过景德镇时,竟然将陈列在陶瓷美术研究社的大量瓷器精品掠走,还向窑主们勒索了80万大洋。这绝对是中国乃至世界陶瓷史上最卑污的一页。

不用再枚举了。收集到这些鲜活的、带着泥浆和烟火味的素材以后,我变得兴奋,就像自己收藏了一批瓷中名品。于是在对素材进行咀嚼之后,兴冲冲地铺开纸笔。我选择了御窑关闭前后这段非同寻常的时光发生的重要事件,串联起御窑500多年的皇皇历史,书写了与御窑官窑相关的众多人物。没有费太多的时间便完成了初稿。

但在几天后重读初稿时,我一下变得有些沮丧了。因为我发现,浩如烟海的素材激发了我的灵感,也束缚了我的手脚;精美的瓷器和精彩的故事点燃了我的想象,却控制了我的思维。整部作品主要是在写瓷器,很像一本科普读物,照这书里写下的内容操作,完全可以造出瓷器来;全书又像一本故事集,罗列了大量引人入胜的趣事,而小说最需要的人物命运与形象,则完全被淹没在故事和造瓷工艺之中。

河里丢了篙,还得到河里去捞。我对瓷器的思索在继续:瓷器看似是金木水火土造就的神奇,是釉与彩合成的尤物,其实更是人的精神、意志、品质、智慧的集合,是特定时代孕育的胎儿。器以载道,在瓷器身上集合着天道、世道、人道,承载着匠人的心志忧乐,凝结着时代的进退治乱,辉映着国家的盛衰荣辱,所以瓷器的神奇,在于人的伟大;瓷器的光华夺目,是人的精神闪烁。

厚德载福

——《厚福:人与中华鲟》创作谈

□钮 敏

内容提要

中华鲟是中国特有的珍稀鱼类、濒危物种,已在地球上繁衍生息1.5亿年,是现存最古老的脊椎动物。它们生长金沙江,咸活在长江,是长江生物链的重要一环,也是长江流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种”。保护中华鲟,从某种意义上说等同于保护整个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和其他的水生生物,在长江“十年禁渔”正式启动的今天,尤其具有重大意义。

“厚福”是一尾由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和北京海洋馆成功救护的野生中华鲟。作为目前我国人工驯养条件下仅存的野生中华鲟,它代表了中华鲟实现自然繁殖、重建野外种群希望。在它的身上,凝聚着众多无私付出的科研工作者和海洋馆人的心血与汗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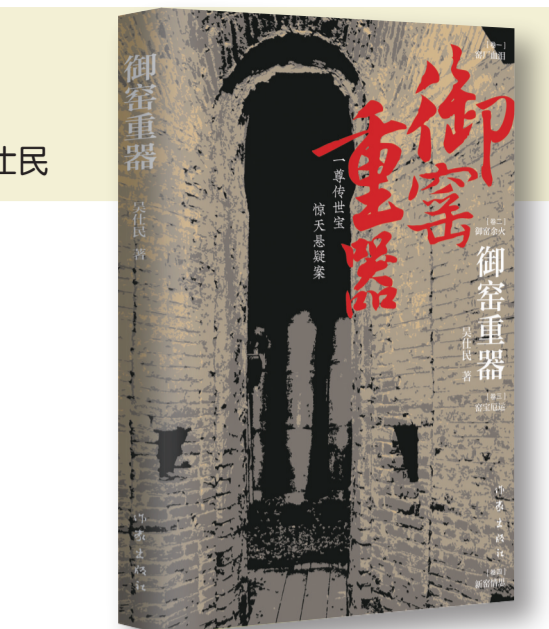
专家们与专业养殖人员的紧急救治,终于暂时保住了它的生命。为此,专家们取“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意,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后福”。在将“后福”从荆州运送至北京的路上,出现了让人震撼的一幕:“后福”在水箱中两度把头撞向车尾,冲着长江的方向!

在工作人员的细心照料下,“后福”的体能一天天恢复,身体也再度成长,2017年性腺再一次发育。为此,海洋馆的工作人员又为“后福”改了一个全新的名字“厚福”,取“厚德载福”之意,也表示“厚福”作为目前我国人工驯养条件下仅存的野生中华鲟,在人类的细心关爱中,今后能够更好更健康地成长。

海洋馆救护国宝中华鲟已走过了15年的历程,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心血,而且通过救治中华鲟也了解了这一古老物种的习性,尤其是其中蕴含的太多感人故事。其间,也编辑出版过《中华鲟的故事》和多种海洋科普书籍。

我被胡维勇先生的一番话深深震撼,燃起了一股难以抑制的创作激情,立誓要写出一部文学作品,让众人了解中华鲟这一和恐龙同时代的国宝,增进对它的保护意识。通过查阅有关中华鲟的海量资料,治好“长江病”“实施长江”“十年禁渔”计划”等字眼纷纷呈现在我眼前,让我愈加感到写这本书的重要与迫切性。于是,在2020年8月底,趁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势头稍稍减弱之时,我踏上了《厚福:人与中华鲟》一书的采访台湾路。

来自台地区的杨道明先生是我采访的第一人,他从最初只与海洋馆签约两年坚守到了今天。身为海洋馆科技部主任和水族部经理,从给鲨鱼搬家为中华鲟腾位,到让中华鲟开口进食,再到完成中华鲟的人工繁育,他都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功臣。



老子曰:大象无形,大道至简。但瓷器的大美之象却不是无形,而是形态万千;瓷器上承载的道也不是至简,而是无比的丰厚深邃,让人赞叹,让人感慨,让人深思,有时也让人遗憾,让人痛惜,让人唏嘘。

我的思路变得开阔了,我甚至有了有悖常理的想法:那些仅供少数人欣赏把玩的精品美器究竟价值几何?如果把制作这些瓷器的财力物力精力,像西方工业革命时一样,用于大力发展工业,其结果又会怎样?由是,我对瓷器的体察便有了一种豁然开悟的感觉。禅宗中的云门宗有一段悟禅的名言: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把这段话移到我对瓷器的识知上,觉得颇为恰切。

又一番苦苦思索之后,我对素材重新梳理,对初稿大改大删,大增大补。以塑造人物统率故事,以突出人的精神书写造瓷工艺,着力刻画造瓷人的性格、命运,彰显人的精神,笔墨集中在一群与瓷有关的人物形象上。他们中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督陶官、瓷艺术家、工匠、窑业老板、军阀、县令,还有日本人。为此,忍痛割舍了许多有滋有味的情节。

当然,中国的瓷业,尤其是中国的官窑御瓷,本身就是一部传奇,充满神秘奥妙。窑火里有着许多无法看清、无法判明的玄妙,而由瓷器衍生的故事也像瓷器那般有着超乎寻常的吸引力。所以,在服从人物塑造的同时,我也在书中留下了大量源于真实、与瓷的特质和精致密切相连的种种故事。

书籍初定之后,我又专程去到景德镇,征求一些专业人士的意见,他们以制作精品瓷器般的态度,指出了书中的几处“硬伤”;作家出版社的编辑宋辰辰女士为本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一并致谢!

行文至此,本应当住,但我还要尾暨一语:愿天下对瓷器有兴趣的朋友,去探求、感悟隐藏在瓷器中的奥妙与大道,去体味制瓷人与众不同的工匠精神。

在会议室,我与王彦鹏、张艳珍、蔡经江、贺萌萌4位鲟鱼馆工作人员见面。按照一般人物描写的套路,似乎应该形容一下人物的外貌特征。但是,当时与我对面就座的4人全都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即便如此,我仍然能感觉到一股挡不住的青春之气扑面而来。后来,我又数次来到海洋馆,看张艳珍和王彦鹏戴着口罩精心配制饵料,看蔡经江和贺萌萌全副武装下水作业。依然没能看清他们的面庞。

直到最后一次来到鲟鱼馆工作间,我终于看到了刚刚完成水下作业的贺萌萌,如出水芙蓉般娇俏。还有沉稳的王彦鹏、知性的张艳珍、质朴的蔡经江。他们摘下口罩的一瞬间,让我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如果你想要生动地描写一个人,很多时候真的无须画脸。之前有关他们的章节我已写就。看到他们一张张生机勃勃的面庞,印证了我在文中描绘的每个人的神韵。

初冬时节,我来到武汉,拜访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危起伟、杜浩、刘志刚和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张先鋒等专门从事研究和保护我国珍稀水生动物的研究员和专家。在写作过程中,又电话采访了长江所荆州太湖中华鲟实验基地的熊伟、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的班璇,得知了他们十几乃至几十年来,为中华后继有“鲟”,在濒危水生动物的挽救方面所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

从2021年1月1日起,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正式实行为期10年的全面禁渔,是从全局计、为子孙谋的重大决策部署。我接通了武汉市渔政船检港监管理处负责人陈嘉的电话,了解了他们守护长江水域、严打非法捕捞犯罪行为的非凡经历。

阳春三月,在湖北荆州召开的“中华鲟保护联盟”年会上,3月28日被设立为“中华鲟保护日”。“厚福”和它的同伴们,不仅有望看到10年之后重建和恢复的中华鲟自然种群,而且从2021年起有了自己的专属节日!这让更多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华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长江生物链的重要一环,是长江流域水生态系统的“旗舰种”和“伞护种”。保护中华鲟,从某种意义上说等同于保护整个长江流域水生态环境和其他的水生生物。

在这里,我要衷心致敬并感谢书中所写到的曹文宣、张显良、胡维勇、危起伟、杜浩、刘志刚、张先鋒、杨道明、郑延宇、王彦鹏、张艳珍、蔡经江、贺萌萌、向军、班璇、熊伟等先生、女士,你们拯救以中华鲟为旗舰的水生动物和守护长江“母亲河”厥功至伟。感谢你们给了我创作的激情和灵感,更感谢你们带给我的惊喜与感动!

还要特别致敬并感谢没有写进书中,但多年来致力于中华鲟研究与保护的专家、学者、工作者和志愿者们。感谢你们为保护长江和濒危水生生物所做的默默无闻的奉献与坚持。

同时,也真诚感谢刘昕晨、颜华、栾钢、林子、张华、余颖仪、胡燕晖等先生、女士对本书的鼎力支持。感谢作家出版社编辑钱英和杨新月女士,以她们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验和严谨细致的工作,帮助去掉拙作中许多不成熟的地方,最终有了今天呈献给各位读者的这本《厚福:人与中华鲟》。